

张光直著

张光直作品系列

番薯人的故事

张光直早年生活自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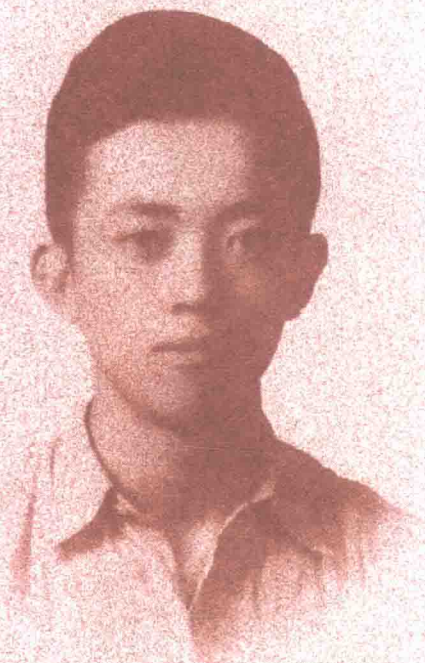


张光直作品系列

番薯人的故事

张光直早年生活自述

张光直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番薯人的故事:张光直早年生活自述/张光直著.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7

(张光直作品系列)

ISBN 7-108-01289-8

I. 番… II. 张… III. 张光直-生平事迹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2842 号

责任编辑 ◆ 孙晓林

封面设计 ◆ 海 洋

版式设计 ◆ 姜仕依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新知电脑印制事务所
印 刷 北京市宏文印刷厂

1999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张 2.75 字数 51 千字

印数 0,001-7,000 册

ISBN 7-108-01289-8/K·280 定价 6.80 元



作者近照(1997年10月摄于台北板桥林家花园)



1951年12月30日,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师生同乐会摄影留念
(前排左起:宋文薰、芮逸夫、董作宾、李济、陈绍馨、凌纯声、陈楚光;后排左起:李亦园、张光直、谢剑、任先民、唐美君、林明汉、陶树雪、许世珍、丘其谦)



1997年10月23日因主持先商文明研究计划,在商丘发掘东周时代宋城城墙(左起第三位蹲者为作者)



1955年在哈佛大学就读的第一年，与董同和摄于哈佛脚下



1995年12月11日，与大哥张光正共同出席“漂泊与乡土”张我军学术研讨会

张 光 直 作 品 系 列

- ◎ 番薯人的故事
- ◎ 考古人类学随笔
- ◎ 中国考古学论文集
- ◎ 中国青铜时代

目 录



前言	1
父亲、母亲和他们的朋友们	4
北京的生活	11
师大第二附小和男附中	16
回台	23
四十年代的板桥	26
建国中学	29
二·二八事件	32
建国中学(又一章)	37
四六事件	44
监狱生活	53
回到情报处	59
内湖	66
回家	70
后记	73
附录一	76
附录二	80

前 言



拉丁语 *Ipomea batatas*, 英语 *sweet potato*, 汉语“番薯”, 是一种块茎类的植物, 植物学家都说它起源于南美,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 把它带到全世界去。它到明代末年才传到中国, 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水手们把它传到了中国。这种作物非常适合中国山区干地, 所以在中国长得十分茂盛。

拉丁语 *Colocasia esculenta*, 英语 *taro*, 汉语“青芋”或“芋仔”, 也是一种块茎类作物, 植物学家说它起源于东南亚, 包括中国南部和马来西亚。它的年代与东南亚的栽培植物(例如稻米)一样地早, 大约一万年以前。

公元 1895 年, 大清帝国与日本打了一个大海仗, 输得一败涂地, 被迫将台湾岛给予日本。从此, 台湾岛上的居民便成为“亚细亚的孤儿”。因为台湾岛的形状很像一个白薯, 所以岛上两三千万的汉人常常叫他们自己为“番薯人”。我父亲就是一个“番薯人”, 他在 1924 年从台湾到北京念大学; 本来念的是中国大学, 后来承吴承仕先生介绍, 转到北京师大, 在那里碰到我母亲。我母亲是湖北黄陂人, 那年只有 18 岁。我父亲 23 岁, 两人相恋, 母亲家里不同意, 两人便私奔台湾。在台湾举行了一个隆重的婚

礼。证婚人林猷堂先生，介绍人洪樵、王敏川二位先生，地点是在台北江山楼。从1926年到1941年，一共生了四个儿子——光正、光直、光诚、光朴。

我们四个兄弟都生在北京，我们都是说标准的京片子，但是因为我们祖母不会说北京话，而且我家常常是台湾人在北京歇脚的地方，有很多台湾人来往，所以我们兄弟也会说台湾话，不过都程度不一地有点北京腔。我们从小学就不喜欢日本人，虽然学了六年日文，但是日文只能看，不能说，也不能写。我们自己认为毫无疑问地是台湾人，是番薯人；但也是闽南人、中国人。

现在的台湾人也自称为“番薯人”，但是有一个新名词加入了族群语汇，那就是“芋仔”，指1945年以后来的外省人。胡台丽说“芋仔”这个词是1949年以后，从大陆来了六十万大军之后开始出现的^①。这些阿兵哥再加上之前来的外省人，被台湾人称为芋仔，或老芋仔。芋仔和番薯人现在被人为地界定为两个刻板印象：芋仔人不说台语，不与台湾认同，也痛恨日本人；番薯人说台语，本土性强，对日本人有亲切感。

我们一家人用新的语汇就无法分类。事实上，三四十年的台湾人，都不能清清楚楚地分出番薯人和芋仔。在北京的台湾人，除了我们一家以外，且举几个例子：徐木生、张深切、黄烈火、柯政和、江文也、林焕文（林海音的父亲）、连震东、苏芴雨、赵炼、苏新、苏子衡、谢文达、蓝荫鼎、郭柏川、杨开华（杨英风的父亲），这些人可以说是

^① 胡台丽《芋仔与番薯——台湾“荣民”的族群关系与认同》，《民族学研究所集刊》69。

以中国人自认的。但是今天认同的问题就不是那么简单。我相信他们都会很乐意地被叫做番薯人。但是别的称呼呢?我们无法知道。

我弄不明白的是：青芋在台湾已经有一万年以上的历史，当代的政论家却用它来象征来到台湾只有半世纪的大陆人。而番薯这个植物在台湾只有三四百年的历史，但却用它来象征台湾本土人。也许是因为我们台湾汉人的祖先抵达台湾和番薯来台湾的时间差不多同时，反而芋仔到达台湾的时间已经不能在人的记忆中回想得到。芋、番薯，都是象征性的言语，而象征是流动的。老芋仔本来指来台军人而言，现在芋仔又包括非军人。第二三代更没有一定的规矩来说了。妈妈也许是云林人，爹爹是上海人，自己是生在台湾，长在台湾。也许会说点闽南语，也许会几句家话，也许只会台湾国语。这种人，有时被父亲强迫说是上海人，有时随自己的意思说是台湾人，多数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哪里人。

我知道我是哪里人。在 30 和 40 年代，只听见人说番薯人，与其相对的就是日本人、四脚(Sika)。将其包围的观念是唐山人或阿山。我和父亲都是唐山人或番薯人，这都是特殊的唐山人。40 年代以后，族群的观念有连续的改变，但是，那是在这本书的故事发生以后的事了。



父亲、母亲和他们的朋友们



板桥镇上的少年张清荣,约于 1915 年

1902 年, 父亲诞生在板桥——台湾北部的一个小镇, 原名张清荣。我的祖父张再兴(一说张再昌), 是个小包商, 专做小桥等小型建筑工程。祖母姓陈, 是板桥港仔嘴人。父亲从小住在板桥, 板桥公学校毕业(即现在的板桥国小), 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老师, 就是板桥国小的林木土。板桥国小现在的校歌, 说是父亲写的词; 最近板桥国小要找一个校友作个纪念石像, 他们就作了一个张我军的头像。板桥公学校毕业以后, 父亲到厦



台北板桥国小校园内张我军塑像落成(1997年)

门一个日本银行做事,在厦门改名字叫张我军。

父亲没有兄弟,有几个妹妹都给人了(生了女儿,自己不要,送给别人,是台湾早年的恶习),只有一个妹妹叫张淑燕还有联络,嫁给曾健成,有两个儿子。我的祖父有一个妹妹,嫁给土城姓何的,有五个儿子;祖父的五个堂兄弟,最大的叫张黑硬,是个农夫;老二张松,在板桥作代书,有四个儿子,还有一个从良的小老婆,叫凤子,生子名

光华；老三叫张坤元，在林本源家管过账；老四叫张望洋，也在林本源家里做过管家。我祖父、祖母和父亲过世之后，骨灰都埋在属于张松产权所有的土地上。

1955年，父亲以52岁的英年去世。他是可以多活很多年的；但是他好喝酒，说真话，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人能把他喝到桌子底下去的。长年的喝酒伤害了他的肝脏，50岁时又在台中街上吃了不洁的食物，染了甲种肝炎。这些多方而集中的攻击，终于打倒了这个原本是一个农家小伙子的健康身体。

母亲原名罗文淑，她的身世比起父亲来是要苦些。外祖父是四兄弟中的大哥，生了一女一子。女儿是这一代里的大姐，就是我的母亲。儿子自小患有精神病，20岁时娶了一门亲事，想用冲喜来治他的病。婚后生了一个女儿，病是一点没好。三四年后，舅舅就因为老肺结核去世了。舅母只有20岁左右，只好带着小女儿和外祖母同住，守寡；解放后，据说舅母嫁了一个打鼓儿的。到了70年代我们重现于北京时，外祖母、舅母、表妹三代都不在。外祖父的二弟是个军人，一直跟着张继。只有一个独子，叫文浩。承继父业，上了黄埔军校第八期，在蒋介石手底下做到中将，一度还做过“实践学社”的社长。可是他和蒋经国不合，所以老蒋死了，文浩的军事事业前途也就无望了。

母亲的三叔是个衙门的刀笔吏，有一个儿子作海军军官。母亲的四叔，也就是外祖父的小弟，在官场作一个中级的官吏。他的大儿子文绍，一想到他就想到巴金的小说《家》里面的大哥觉新，为了家而牺牲自己的爱情。文绍



张我军发表《糟糕的台湾文学界》严厉抨击台湾旧文学(《台湾民报》1924年2卷24号)

的弟弟文中也是军人；但他既非黄埔，也不是海军。他就是寻常的小兵，从二等往上爬，我最后看见他的时候，他大概爬到了中尉。

在这个大家庭里面，人，是不好做的。外祖母守寡，舅母也守寡。外祖母是个做人的榜样，“长嫂如母”，俗语如此说。但是在罗家（和其他类似的家，我猜），“欺负老实人，端寡妇门”恐怕更是实情。外祖母住在北京湖北会馆的生活上的困境，是可以想像的。张我军走入

他们的生活，今天客观地看来，不能不说是一个好消息。父亲第一次到北京，才22岁。母亲17岁。两人一见钟情，但一路充满了绊脚石。母亲还未成年，而她的监护人——四叔对这个“异国”的青年感觉很杂乱。“台湾人！台湾人就是日本人！”

与日本人打仗是分秒间事，女儿怎能嫁给“日本人”！可是张我军这位青年，从哪边看也不像个日本人。不错，他会说日语，而且说得和日本人一样。可是他的北京话，也听不出来一点外国口音。人长得英俊，外祖母看愈喜欢。那么





张我军、罗心乡二人于 1925 年在台北结婚后，摄于板桥林家花园



西单手帕胡同丙 25 号(现为 75 号)

番薯人的故事





父母亲摄于北京手帕胡同故居大门门口

天真，那么用功。

四叔挣扎的结果，是民族主义（但是是一种伪民族主义）的胜利。母亲马上被安排出嫁，嫁给一位小有钱的商人。这时候我父亲在台湾编《台湾民报》，母亲与外祖母急得团团转。不妨，这时就有朋友相助了。父亲在北京认识台湾人不少，其中有一个鹿港人，叫洪榑，字炎秋。是当代大（旧体）诗人洪弃生的儿子。

40年代 子。他那时在北大念

书，父亲上次来北京时便已熟识。他听到了这个消息，便连忙写信给父亲，父亲接到信，把一切事情抛下，兼程赶到北京，与母亲、外祖母，和几个亲密的男女同学商量，最后决定回台湾去结婚。为了表示尊礼，一行分两批人，到了台湾找到当时台湾最受尊敬的绅士林献堂先生来证婚。但是没有用，四叔还是不同意，说他们是私奔，而且登报正式与罗心乡（文淑）解除叔侄关系。不过，“张大哥”和“大姐”就成了他们那一代兄弟姐妹间的英雄人物。

从这件事情可以想见洪榑是父亲最好的朋友，后来

